

晚清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 ——以陳澧與朱次琦為例

曹美秀*

摘要

本文以漢、宋學問題中較少人討論的學術歸趨這一面向為核心，比較陳澧與朱次琦對朱子的論述，以釐清二人的學術特質，檢視關於漢宋調和的論述。經由對二人心目中朱子形象的分析，可見二人雖無漢、宋門戶，但他們看待朱子的角度，包括朱子學術的重心、精神、治學方法，及評價朱子於學術史上的定位、解釋朱子與乾嘉學術的關係等，都有極大的差異。因為二人是分別立足於漢學／鄭玄、宋學／朱子，從不同的窗口望出，以致視野各異，因此，將陳、朱二人籠統地歸入漢、宋兼采或調和的大框架中，是有待商榷的，而今日相當普遍的，對晚清漢宋調和風氣之論述，亦有再深入分梳的必要。筆者以為，晚清時期漢、宋不再強烈對峙，並非因為雙方立場的讓步或標準的轉換，而在於調整態度，並將對方收編於自己的系統之內，但其立場與堅持，就在此調整的過程中益形顯現。然而，立場與主觀意識，不必然等同偏見與意氣之爭，陳澧與朱次琦對異說的寬大胸懷與包容態度，乃承清初以來，以門戶之爭為患的訓誡，在乾嘉學術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與實踐的結果，為漢、宋學在晚清的新面貌。

關鍵詞：晚清、漢學、宋學、陳澧、朱次琦、漢宋調和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Views of Zhu Xi in the Han-Song Learning Debate of the Late Qing: The Example of Chen Li and Zhu Ciqi

Tsao Mei-Hsiu

Project-Appointe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views of Chen Li(陳澧) and of Zhu Ciqi(朱次琦) on Zhu Xi(朱熹)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s, an aspect that has seldom appeared in discussions on the Han-Song learning debate. Thi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intelle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scholars gives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mpromises that were made in this debate. Their differences include evaluations of Zhu Xi's intellectual center, spirit, method of inquiry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u Xi and Qianjia(乾嘉) scholars. These differences arose since, of these two men, one based his views on the Han Learning tradition stemming from Zheng Xuan(鄭玄) and the other from the Song Learning tradition of Zhu Xi. Thus the commonly held view that these scholars were part of a late Qing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should be reassessed, as should the general view of the structure of this reconciliation. Although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Han and Song learning was not as intense as it had been, this was due not to basic changes in criteria or position, but rather to adjustments in attitude that enabled each side to incorporate aspects of the other in its own system. The comparison thereby clarifies the attitude and position of each. Chen Li and Zhu Ciqi both benefited from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Qianjia period and displayed great tolerance towards each other's school, which is a new feature of the late Qing debate between Han and Song learning.

Keywords: Late Qing, Han Learning, Song Learning, Chen Li(陳澧), Zhu Ciqi(朱次琦), Zhu xi(朱熹),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an and Song learning

晚清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 ——以陳澧與朱次琦為例

曹美秀

一、前言

晚清向被視為漢宋調和成風的時代¹，陳澧（1810-1882）與朱次琦（1807-1881）因時、地相近²，且具漢宋兼采之特質，而常在漢宋調和的論述中，被相提並論³。然而，現今常見的漢宋調和之論述，實乃學界討論漢、宋學問題的方法之結果。今人對清代漢、宋學問題的相關論述，以著眼於考據、義理的治學方法為主⁴。然而，

¹ 如梁啟超以為方東樹之後，「治漢學者頗欲調和漢、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訓》，陳澧著《漢儒通義》，謂漢儒亦言理學。」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 112-113。朱維錚以為漢宋調和論是晚清的「時髦學說」。見〈導言〉，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10。餘不枚舉。

² 陳、朱二人同居粵中，因此而將二人並論者，如劉禹生的〈嶺南兩大儒〉，《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278；左東陽的〈九江先生學說論略〉（《朱九江先生一百五十年誕辰紀念特刊》），收入《朱九江先生行誼輯述》（香港：旅港南海九江商會，1976），頁 13；李時權主編之《嶺南文化》（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等，餘不枚舉。

³ 持此論者如梁啟超：「廣東近代幾位大師，都主張調和漢宋，可以陳蘭甫、朱九江為代表。」梁啟超，《儒家哲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6），頁 67。劉師培以陳澧「澧學通漢、宋」，朱次琦則「學兼漢宋，與澧差同」。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劉申叔先生遺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 669。或不將二人並論，但以漢宋調和為二人學術特質者，如楚金以為：「為漢、宋兼融之學者，其端啓于李申耆，而終于陳蘭甫。」楚金，〈道光學術〉，收入沈雲龍輯，《中和月刊史料選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61 輯），頁 262。丁寶蘭說朱次琦：「認為漢學、宋學並非互相矛盾，主張調和二者。」丁寶蘭，〈簡論朱次琦〉，《中山大學學報》4（1983），頁 81。其他論晚清漢宋調和風氣，而舉陳、朱二人為例者極多，不枚舉。

⁴ 如錢穆說阮元「頗主求義理，故漸成漢、宋兼采之風」。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489。余英時說：「這種漢、宋（即所謂考據與義理）的對峙，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即已顯然。」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事業公司，1978），頁 89。二人所云漢、宋兼采或對峙，皆立足於考據與義理的角度，後人循此模式者極多，不枚舉。

漢、宋學的問題牽涉極廣，除了方法的層面，應還有其他的切入點⁵。筆者分析清人著述及既有相關論述，以為清代的漢、宋學問題，主要涵蓋三個層面：義理與考據、乾嘉學術與宋朝學術、漢朝學術與宋朝學術⁶。義理與考據，即今人最常用以討論漢、宋學問題的方法層面。「乾嘉學術與宋朝學術」，指清代漢學家與宋儒思想之爭執⁷，誠如徐復觀所云：「乾嘉諸人所以反對宋明理學，只認為他們之所謂理，不是孔孟之所謂理，斷不曾懷疑到讀書的目的是要明理。」⁸因此，除了訓詁名物等考據成就，乾嘉學者自有其義理思想，且欲與宋人爭勝，今人於此，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⁹。「漢朝學術與宋朝學術」，指清代學人不同的學術趨向，或以漢為歸，或以宋為幟，其指標人物，分別為鄭玄與朱熹¹⁰。或許因為漢學家尊奉鄭玄、宋學者推崇朱熹，已

⁵ 張君勱便曾在治學方法之外，又由「道之所在之異」、「道與佛教之關係」、「心性為虛為實之爭」等角度，討論漢、宋學之異，詳參其〈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再生》臺字 4：3（1974），頁 1-24。

⁶ 詳參拙著《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此書為筆者博士論文，該論文始撰於 2003 年，而於 2004 年三月間完成，後於 2007 年 5 月出版。由此三個層面討論漢、宋學問題，是自 2003 年始撰該文即有的想法，後來出版成書，亦未有所變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2007 年 12 月出版《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理論篇》，中有張麗珠〈從「漢宋之爭」看清代的義理學轉型〉一文，亦歸納討論漢、宋學的三個層次，與筆者所分析的三個層面頗為相近，或者閉門造車，出而合轍。然張氏以為漢、宋之異，主要在於「哲學範疇的理念之爭」（頁 194），筆者則以為除了哲學理念，漢、宋學的立足點之異，及與之相應的評騭學術之標準，亦是討論漢、宋學問題不可略過的部分，此即本文欲論述的觀點，詳後文。

⁷ 按：筆者並非以宋明理學代表整個宋朝學術，但乾嘉學人於批評宋人思想時，多以「宋學」、「宋儒」為稱，故權以「宋朝學術」稱之。也就是說，雖然「漢宋」一詞所指涉的內容極廣，但與清代漢宋學問題關係密切的「宋學」部分，在思想層面上，以宋明理學為主，且清人幾皆以「宋」泛稱之，為免另用他詞可能引起的更多定義、內涵指涉等問題，故以「宋朝學術」稱之。

⁸ 徐復觀，〈兩篇難懂的文章〉，收入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學生書局，1985），頁 483。

⁹ 林慶彰便在《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的〈導言〉中，強烈指出乾嘉義理學存在的情況。《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頁 6。漆永祥的《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也極力澄清對乾嘉學術脫離現實、沒有思想等之誤解。近幾年來相關的論著，如：葛榮晉主編《中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第 32 章「乾嘉學派與清代實學」；《乾嘉學者的義理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收錄的二十幾篇文章；張壽安的《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張麗珠的《清代義理學新說》（臺北：里仁書局，2002）等，也朝這個方向而有相當的成果。其餘相關論著尚多，不枚舉。

¹⁰ 按：筆者亦不以清人所取的漢學或宋學為漢、宋學之全，亦不以鄭玄、朱熹足以代表全部的漢、宋

爲不易之論，所以今人討論漢、宋學問題，較少在此點上著眼。然而，治清代學術者，都熟悉不少漢學家稱許程朱及宋儒的話語，如惠士奇手書楹聯：「《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¹¹江藩云：「治經宗漢儒，立身宗宋儒，則兩得矣。」¹²阮元云：「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¹³但卻無人否定，惠士奇、江藩及阮元爲色彩鮮明的漢學者¹⁴，江藩甚至被指爲激起漢、宋強烈對峙的首要人物。與宋學者相同，他們對宋儒、程朱之肯定，明確見諸文字，然漢、宋之異趨，實無可懷疑。筆者以爲，二者之差別，關鍵在於「如何」看待漢宋／鄭朱，此與前述研究方法及義理思想是環環相扣的，但三個層面的問題皆牽涉極廣，若混而論之，恐治絲益棼；若僅處理其中一兩個部分，恐難釐清漢、宋學間糾結的問題。

今日相當普遍的晚清漢宋調和之論述，乃前述以治學方法爲著眼，或者三個層面混而論之的結果，若將漢、宋學問題的不同層面分別處理，那麼，陳、朱二人，是否應因漢宋調和而被並論，或許有再思考的空間；學界普遍接受的「漢宋調和」之內蘊，亦可有更明晰的分梳。是以本文以漢、宋學問題中，較少人討論的第三個層面爲切入點，以箇中關鍵人物之一——朱熹——爲焦點，比較陳澧與朱次琦心目中的朱子形象，由此分析二人的學術內涵與特質，以反思漢宋調和的論述，並作爲思考晚清漢、宋學問題的參考。

學，但本文所論爲清代的漢宋學問題，故即以與清代漢宋學緊密關聯的漢代經學、宋代理學，及其指標人物鄭玄、朱熹之學，爲漢、宋學術的內容。漢、宋學涵蓋面極廣，本文所用之詞，目的僅在釐清清代漢、宋學問題中的不同層面，而非用以討論漢學或宋學之全。因另立名目，恐反致紛繁，故即以清人習用之內容，指涉漢代及宋代學術。

¹¹ 江藩，《宋學淵源記》（臺北：廣文書局，1977），頁192。

¹² 江藩，〈漢宋門戶異同〉，《經解入門》（臺北：廣文書局，1977），卷3，頁5。

¹³ 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擘經室一集》，卷2，頁37。

¹⁴ 按：阮元雖也被指爲具漢宋兼采的特質，但其主要立場是漢學的，乃無可懷疑，觀其所主持編刊的《皇清經解》可見矣，詳可參何佑森，〈阮元的經學及其治學方法〉（《故宮文獻》2：1（1970），頁19-34；張麗珠，〈阮元向「群學」過渡的「相人偶」仁論〉，《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頁298-335；劉德美，〈阮元的考據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4（1986），頁109-139。

二、陳澧與朱次琦的漢、宋學趨向

陳澧與朱次琦皆不欲爭意氣、立門戶，因此，都被視為漢宋兼采或調和漢宋者，但在「兼采」或「調和」之同外，二人實有漢、宋趨向之異。

陳澧認為「漢儒義理之說醇實精博，蓋聖賢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¹⁵，故撰有《漢儒通義》以發明漢儒義理之「絕學」¹⁶。就筆者分析，《漢儒通義》既是陳澧個人學術理念、讀書經驗的具體表現，也是其以漢學自任的重要成果，更在他掌教菊坡精舍後，成為具體的教材，為陳澧融治學與教學為一的成果¹⁷，而其對象是「漢儒」。陳澧並曾敘述自己的學術使命，一在引領後學，一為表彰鄭學¹⁸，其以漢學／鄭玄為典型的學術趨向，實極彰顯。

至於朱次琦，他以紀昀為清代「漢學之前茅」，阮元則「漢學之後勁」，然其所倡之小學，僅六書而已，因此指責紀、阮二氏禁錮天下之人才¹⁹，並批評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云：「六書小學，治經者所時資也，必謂先盡讀小學諸書，而後可通聖人之道也，將徒蔽之也，為其書之不能無鑿也。」²⁰對照戴震所云：「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²¹二人之異，有如天壤。朱

¹⁵ 陳澧，〈漢儒通義序〉，《漢儒通義》（臺北：華文書局，出版年不詳，影印《東塾叢書》本），序錄，頁 1a。

¹⁶ 陳澧以為「宋、元、明儒者自出己意以說經義，竟無人於漢儒傳注內尋求義理」，故以之為「絕學」，此論見〈與趙子韶書六首〉，《東塾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影印富文齋刊本），卷 4，頁 28b。

¹⁷ 關於《漢儒通義》，詳參拙著〈陳澧《漢儒通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0（2007），頁 267-306。

¹⁸ 詳陳澧，〈復王倬甫書〉，《東塾集》，卷 4，頁 15a。

¹⁹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朱九江先生一百六十年誕辰特刊》），收錄於《朱九江先生行誼輯述》，頁 5。

²⁰ 同前註，頁 7。

²¹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戴東原集》，《戴東原先生全集》（臺北：大化書局，1987，再版），卷 9，頁 7。

氏又自述著述心志，欲倣黃梨洲《明儒學案》，「輯一書以箸我朝一代儒宗」²²。眾皆知《明儒學案》所著錄者，基本上都是與宋學一脈相承的學者，漢學家推許者如楊慎、陳耀文、胡應麟、焦竑、陳第等，皆不在黃宗羲著錄之列。且朱次琦之前已有江藩的《漢學師承記》、阮元編刊的《皇清經解》等，著錄清代重要的漢學家及經學著作，朱氏顯然不以爲此二書足以表彰清代「儒宗」，並明云：「不欲分漢學、宋學，如江鄭堂《師承記》云也。」²³他同時將朱子與紀昀等漢學家相比，以爲朱子方得古小學之全²⁴。其以宋學／朱子爲歸的學術趨向，實極瞭然。

陳、朱二人對學海堂的態度之異，更是二人學術異趨之明證。道光十四年（1834），陳澧與朱次琦同被舉爲學海堂專課生，陳澧赴之，後並爲學海堂學長近三十年；朱次琦則以疾辭不赴，後來且不願述及此事。

需強調的是，筆者所謂趨向，指陳、朱二人心目中的學術典範，分別指向漢學、宋學，與所謂漢、宋門戶者實異。陳澧與徐子遠書有云：

吾兩人讀書皆同，惟宋儒書弟未讀。此不可少，又不宜再遲，盍及今讀之。百年以來，專門漢學者多不讀此，亭林、百詩則熟讀之矣。²⁵

他明確表示，自己並非「專門漢學」者，之所以非專門漢學者，正因除了漢人之書，亦讀宋儒之書，此即陳澧被視爲調和漢宋之故，今人並有專門討論其漢宋調和觀點的文章²⁶。除《漢儒通義》外，陳澧又編有《朱子語類日鈔》，並明言編撰《漢儒通義》乃「欲與漢學、宋學兩家共讀之」²⁷，的確具兼采漢宋的色彩。但需注意的

²² 簡朝亮編，《朱九江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晚清名儒年譜》，影印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冊5，頁22b。

²³ 同前註。

²⁴ 簡朝亮記，〈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5。

²⁵ 陳澧，〈與徐子遠書二十一首〉（之十六），《東塾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4，頁186-187。

²⁶ 如朱稚華的《陳蘭甫與朱鼎甫漢宋調和之比較》（臺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4）；李緒柏的〈陳澧與漢宋調和〉，《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2005），頁81。其餘有非以漢宋調和為名題，論述陳澧時，頗強調其漢宋調和的特色，如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胡楚生的〈經生與烈士——試論陳蘭甫與朱鼎甫之爲學路向〉，收入其《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3，2版），頁261-288；謝寒楓的〈論陳澧經學觀的形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2（2008），頁28-33等。

²⁷ 陳澧，〈復王倬甫書〉，《東塾集》，卷4，頁15a。

是，《漢儒通義》是陳澧花費多年心力，百般斟酌而成；相對的，其於《朱子語類日鈔》所花費心力不但少得多，甚且《朱子語類日鈔》並非陳澧有意撰作者，而是陳澧讀朱子書時標識卷端的零星劄記，其子宗誼為鈔為一帙，後來宗誼病亡，陳澧因思念亡子，而將宗誼所鈔者，增損排類付刻。從學人著述的角度，不難理解箇中差異之大。因此，雖不持漢、宋門戶，但在陳澧的學術天秤中，漢、宋二者並非等量的。

至於朱次琦，他說：

嗚呼！古之言異學者，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岐。何天下之不幸也！彼攷據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璣文，蠹大義，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如是哉？孔子曰：「道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今為二三子者告，蕲至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²⁸

這段文字，常被引用以證明朱次琦兼采或調和漢、宋。的確，漢學或宋學，乃後人分出的派別或名目，實非孔子所有，朱次琦清楚意識此點，故關紹渠〈朱九江先生紀念碑〉稱朱次琦：「窮極學問，舍漢釋宋，原本乎孔子，而以經世救民為歸。」²⁹可謂確論。然而，無論陳澧或朱次琦，雖認真提出不可有門戶之見、門戶之爭的胸懷與觀點，卻無法意識到自己於漢、宋之間那倚輕倚重的傾向。朱次琦批評《皇清經解》云：

《皇清經解》，阮文達之所詒也，殆裨於經矣，雖然，何偏之甚也。顧亭林之學，不分於漢、宋也，今采其說，尊宋者芟焉（如《日知錄》於《易》謂：「不有程傳，大誼何由而明乎？」之類，今不采）。書以國朝為目，當時之儒，非皆漢學也。若方靈皋者流，迺一言之不錄也。³⁰

當然，我們可以中立的、不拘門戶的角度，來解釋朱次琦說這段話時的立場，尤其他特別強調顧炎武是不分於漢、宋者也。然而，我們不難理解，看待《皇清經解》

²⁸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傳〉引，〈朱九江先生一百五十年誕辰紀念特刊〉。

²⁹ 關紹渠，〈朱九江先生紀念碑〉，〈朱九江先生行誼輯述〉，頁 26。

³⁰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 5。

不應只有漢、宋兩個角度，因此，若要指摘其取擇時有所偏頗，芟除尊宋之言論，也不是惟一的理由，朱次琦特由此點指出《皇清經解》的不當，正顯示他潛意識裡的宋學傾向。

從不廢漢、宋的角度來看，或許可將陳、朱二人，皆圈入漢、宋調和的範圍內，但若注意到其趨漢或趨宋，及由此衍生的相關論點之異，那麼，漢宋調和的論述，或有再思考的空間。

三、陳澧與朱次琦眼中的朱子

前已述及，即使乾嘉時期深具漢學色彩者，也有不少推崇宋儒、朱子的言論，然其所以推許宋儒、朱子，與宋學者實有內蘊的不同，試比較陳、朱二人眼中的朱子形象，便可見之。

陳澧的《東塾讀書記》（以下簡稱《讀書記》）中專卷論朱子，在分量上堪與鄭玄抗衡，他被指為調和漢宋的中堅分子，不可謂無由。歸納他對朱子的論述，頗有與朱次琦相近者，其中強調朱子重視讀書，為一般認為漢宋兼采者的共同論點。陳澧整理其亡子宗誼手鈔讀《朱子語類》的筆記，刊刻成書，便命名為《朱子勸學語》，後才改名為《朱子語類日鈔》，由書名即可知其所鈔之內容，為勸人讀書之語。其〈復王峻之書〉便提及此書云：「俟刻成，當先寄與足下，必更大有助於讀書之功耳，餘不多述。」³¹〈遺稿〉有云：「由宋儒義理歸於讀書，而有本有原（師心之說無本原者棄之），此《學思錄》大指也。」³²陳澧著作中，強調「讀書」者多矣。朱次琦亦云：

讀書者，格物之事也。王姚江講學，譏朱子讀書曰：「致良知可也。」學者

³¹ 陳澧，〈復王峻之書〉，《東塾續集》，卷4，頁170。

³²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1），頁182。

行之，流弊三百餘年。³³

又云：

文恭之學，讀書而靜養也，朱子所法乎孔子者也；文恭之教，使學者端坐澄心，未讀書而靜養，則所養者，未必端倪之正也，非朱子所法乎孔子者也。

³⁴

他強調孔子重視讀書之功，故反對心學之良知、靜養，而朱子則傳承孔子重視讀書的觀點。故他教導學生「讀書之實五」，包括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³⁵，性理之學必與其他四種強烈依賴文獻的學問相輔。故對書籍文獻之閱讀的重視，是陳、朱二人對朱子的共同認識，但是對於所讀之書的分類，二人卻相當不同。

陳澧所述對學術的分類有兩種方式，一是分經、史、子、集四部³⁶，其中又以經部最重要；一是以治學方法分考據與義理二類³⁷。值得注意的是，朱次琦特意將「性理之學」獨立為一類，但對陳澧而言，性理之學只是子部的一部分，其分量輕重相差懸殊。其次，陳澧雖將學問作不同的分類，但他認為學人可專於一類³⁸；朱次琦則以為「讀書之實五」者，乃不可分割的整體。尤可注意者，陳澧強調讀書，

³³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 6。

³⁴ 同前註，頁 4-5。

³⁵ 同前註，頁 4。

³⁶ 陳澧〈與友人書二首〉(之二)有云：「僕讀書三十年，今乃知讀書之法，甲部則注疏、朱子《四書》、《說文》、《廣韻》；乙部則正史、通鑑；丙部則周末諸子、宋五子、陸象山、本朝顧亭林、陸清獻；丁部則《文選》、李、杜、韓、蘇集，此外雖流覽，不敢雜也。四部書以甲部為主……」《東塾續集》，卷 4，頁 193。

³⁷ 如〈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云：「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東塾續集》，卷 1，頁 26）又如〈與徐子遠書二十一首（之二）〉云：「欲如來示所云義理、考證合而為一，恐不易耳，如能補小學工夫，則漢學、宋學皆有基址，然後可以義理、考證合為一矣。」《東塾續集》，卷 4，頁 173。

³⁸ 如《讀書記》朱子卷第十七條引用數條朱子論考據與義理的言論，然後下結論云：「蓋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於其近者也。」《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12。另一方面，陳澧承學海堂肄業生需「擇一書專習」的規定（詳參林伯桐撰、陳澧補編，《學海堂志》（臺北：廣文書局，1971）「課業」部分，頁 68），告誡弟子「博學於文，當先習一藝」〈菊坡精舍記〉，《東塾集》，卷 2，頁 29a-29b。

背後的出發點，在於恐學風虛而不實，所謂虛而不實，乃恐考據學流於瑣碎而無義理之統合，如云：

說經者欲經文之明白無疑也，欲經文之明白無疑者，將以諷誦而得其義也，若既解之明白無疑，而不復諷誦以求其義，則何必解之乎！且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也，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既解亦仍歸於不讀而已矣，解經而不讀經者，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人之讀之而無疑可也。然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而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³⁹

這是對考據學所導致的，皓首不能窮一經之缺失的反省，陳澧提出「讀書」的方法，便欲對治這樣的流弊；但朱次琦所著眼的，乃是陸王心學的空虛不實。因此，同樣強調朱子重視「讀書」，不但所讀之書不同，方法有異，其背後的動機亦殊。這樣的差異，乃因陳澧較偏漢學的傾向，而朱次琦則偏向宋學的結果。

這樣的傾向，表面上只有輕、重之異，但若落實到學術價值的評判上，則表面上的趨向之異，便深化為根本上的價值取向之異，從二人對朱子的評價即可見之。陳澧之稱許朱子，較偏重專門的學術成果；朱次琦則重於性理之學強調的全整之人格修養。陳澧的《讀書記》「朱子卷」，共計四十六條資料，皆針對朱子的讀書成果，也就是對其傳世著作的引用分析，主要內容，是突顯朱子的讀書方法，如第一條云：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答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卻覺不甚費力也。」《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又云：「今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如此。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

³⁹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1），頁183。

學也。⁴⁰

張君勳以為陳澧此言「可謂持平之論」⁴¹，的確，陳澧之論，有本有原，引據確實，其所表出之朱子學，不能說有誤。但陳澧何以「如此」表述朱子之學，背後不能說沒有一個學術設準⁴²。《讀書記》第二條云：

《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又云：「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訓詁則當依古注。』」〈答黃直卿書〉云：「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分明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李公晦書〉云：「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答王晉輔書〉云：「禮書縮訓為直者非一，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朱子重訓詁之學如此。⁴³

《讀書記》朱子卷論述朱子的治學方法及觀點，皆以此方式進行，即引用數條朱子論述同一主題的言論，然後下簡短的結論或案語，或者僅加引用而未有陳澧個人之語，然因主題相同，其欲突顯的觀點是相當清楚的。其第三條論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用漢儒名目；第四條論朱子稱許漢人專家之學；第五條論朱子稱許漢儒注經之法；第六條引朱子稱許漢經學之有用；第七條論朱子「深明漢儒之學」；第八條論朱子稱許鄭康成禮學；第九條論朱子稱許鄭玄解《中庸》「仁」字⁴⁴；第十條引朱子論《說文》之語，並下結論云：「朱子汲汲於刊《說文》如此，為朱子之學者宜知之，為《說文》之學者宜知之。」⁴⁵第十一條，引用朱子論述音讀反切之文字，以為：「朱子於音讀之學，考據詳博如此……朱子講求反切之學又如此。」⁴⁶第十二條論「朱子深於禮學」；第十三條論朱子「講求樂律」；第十四

⁴⁰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301。

⁴¹ 張君勳，〈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頁10。

⁴² 按：張君勳認同陳澧此論，亦未嘗沒有其主觀立場，賀嶽僧便以為張君勳是「贊同宋學」的，而當時與之作科學與玄學之論爭的胡適、丁文江等人，則是「同情漢學的」，詳參其〈清代漢宋學之爭〉，《時代精神》8：3（1943），頁21-31。

⁴³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301-302。

⁴⁴ 第三至第九條資料，分別見前註書，頁302-306。

⁴⁵ 同前註，頁301-302。

⁴⁶ 同前註，頁306-307。

條論「朱子之重《通典》」；第十五條論「朱子知算學」；第十六條論「朱子之講求地理」⁴⁷，以下不一一列舉。我們可以發現，陳澧所列舉朱子治學之重點及長處，所塑造出來的朱子形象，無異於吾人心目中的清代漢學家。其〈與友人書〉有云：

朱子之博學，僕於《學思錄》發明，此《切要語》不必及耳。⁴⁸

按：《學思錄》即《東塾讀書記》的前身，是陳澧中年以後，精心規劃的一部大著作，後雖未全部完成，但由其遺稿及相關文獻中，可見相當多陳澧對《學思錄》的規劃構想，此書可謂陳澧一生學術精華所在。而他所規畫欲於《學思錄》中發明的朱子之學，即其「博學」的特色，的確如我們今日所見《讀書記》朱子卷的內容。因此，陳澧是以「博學」的標準，來擷取朱子之學，以構成《讀書記》朱子卷的內容，而這個博學的標準，便根源於其漢學傾向。尤其當陳澧強調朱子稱許漢人專家之學、漢儒注經之法及其經學內容等，已表明他對朱子的稱述，乃是以漢學為標準。

但是，朱次琦對於清代的漢學，卻有相當嚴厲的批評，前述指紀昀、阮元禁錮天下人才，便是一例。他又指責清代漢學，落入班固所云「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的泥淖，這是因為「嗜瓊」的結果，而嗜瓊乃因深信《詩》有達詁⁴⁹，前述陳澧所舉出朱子重視的古注疏、《說文》、音讀、地理等，都是清代漢學者欲求「達詁」而努力的方向。朱次琦既對追求達詁的意識有異議，對欲求達詁而致力的訓詁等學有瑣碎之譏，當然，他也不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子，而是由「所以明吾學之大」⁵⁰的性理之學，所顯現的全整之人格的角度來論述朱子，如云：

朱子，師程子者也。朱子釋經，不或匡程子之失乎？志遜而辨，辭恭而直，朱子事師之誼也。今之漢學，喜攻朱子，蜩沸者無譏矣，將或中焉，惜夫其不如朱子之事師也。⁵¹

陳澧所見朱子之經學，集中在解經方法及內容；朱次琦則偏重其釋經態度，及由此

⁴⁷ 第十二條至第十六條資料，分別見前註書，頁308-311。

⁴⁸ 陳澧，〈與友人書二首〉，《東塾續集》，卷4，頁193。

⁴⁹ 詳見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7。

⁵⁰ 同前註，頁4。

⁵¹ 同前註，頁7。

顯現的人格。所謂「志遜而辨，辭恭而直」，是一種因內在尊師重道之修養，及謙沖自牧的人格，發而為恰到好處的言辭，因此，雖匡正師輩之失，卻與漢學家言辭犀利、當理不讓人的攻訐截然相異。因此，朱次琦認為朱子匡正師輩之作爲所達致的效果，不在學術問題上的是非之彰顯，而在人格氣度之顯現，與事師之誼的表露。這與陳澧看待朱子，偏重從治學方法、學術成就等角度，是截然相異的。朱次琦又云：

朱子稱呂伯恭變化氣質，何哉？伯恭之少也，性暴怒，及讀《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自克也。朱子稱之，將以告吾學者也。讀書自克，吾學者之事也。⁵²

按：《朱子語類》記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⁵³朱次琦所說朱子稱呂伯恭變化氣質之說，應即據此。可見朱次琦以爲朱子重讀書，目的是欲學者「自克」，即藉由讀書而培養學者的人格氣度，故朱子所云「小學」，才真正是古時「小學之道」，是用以「養大學」⁵⁴的基礎教育。而朱子所云小學的內容乃是：「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⁵⁵正是爲變化氣質的基礎工夫；相反的，紀昀等漢學家所提倡的「小學」，乃從《漢志》而僅存六書而已⁵⁶。但陳澧所述朱子之學的重點，正是訓詁、音韻、地理等，紀昀所云小學的部分。因此，同一朱子也，陳澧與朱次琦所見卻大不相同，正因他們分別從漢、宋學的窗口望出。

看待朱子於漢、宋學術史上的定位，亦有相同的情形。陳澧總是立足於漢學以看朱子，如云：

〈語孟集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答張敬夫書〉云：「秦

⁵² 同前註，頁 10。

⁵³ 朱熹，《朱子語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702 冊，第 122 卷，頁 1b。

⁵⁴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 5。

⁵⁵ 朱熹，《朱子語類》，第 7 卷，頁 1a。

⁵⁶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 5。

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又〈與林擇之書〉云：「欽夫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朱子深明漢儒之學，故不喜南軒刻核之論也。⁵⁷

被視為宋學代表人物的朱子，在陳澧眼中，乃深明漢儒之學者。又云：

來書謂朱子用漢儒家法，此語最有識。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此漢人語，宋人所無，注《論語》尤似漢人，如「巧，好；令，善也。」乃毛《傳》之法。僕嘗謂朱子乃宋儒之講經學者，道學家不知也，漢學家亦不知也。⁵⁸

朱子不但深明漢學，甚至用漢儒家法以注經書，故陳澧把朱子定位為經學家而非道學家，因此，朱子便在漢學傳承的脈絡中，占有一席之地。〈鄭氏全書序〉云：

孔子刪述《六經》，而鄭康成氏為之注，其細者訓詁名物，其鉅者帝王之典禮，聖賢之微言大義，粲然具備，其於先師之說，有宗主有不同，讚而辯之，家法至善，傳之百世而無弊，又於緯候之書、歷數律令之學，莫不貫綜，是亦所謂集大成者也。自魏、晉至隋、唐，數百年朝廷之議論，儒生之講誦，得所依據，聖人之道不墜於地，惟鄭學是賴，雖王肅、許敬宗輩妄肆訕毀，無傷日月。至孔、賈義疏頒行，乃盛極而寢衰焉。宋儒代興，朱子猶稱述鄭學，洎元、明而遂衰絕。然王伯厚采集《易注》，實鄭學復興之兆，本朝儒者講漢學尊鄭氏，此則無往不復之道也。⁵⁹

陳澧以鄭玄為經學之「集大成者」，而魏、晉到隋、唐，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實是鄭學之功。到了孔、賈義疏頒行，鄭學雖衰，但朱子「猶稱述鄭學」，這是他把朱子定位為經學家的原因，而此經學家朱子之價值，乃建立在鄭學發展的脈絡中。因此，在陳澧眼中，朱子是宋儒中少數「講經學者」，少數「猶稱述鄭學者」，是孔、賈義疏刊行後，維持鄭學於不墜的一絲命脈，是漢學的傳人，故《學思錄》大

⁵⁷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304。

⁵⁸ 陳澧，〈與袁卿書〉，《東塾續集》，卷4，頁172。

⁵⁹ 陳澧，〈鄭氏全書序〉，《東塾集》，卷3，頁9a-9b。

旨中「明朱子之為漢學」⁶⁰一項，其意義便不僅止於證明朱子亦講考據、重訓詁而已，更在於把朱子納入漢學體系當中。所以《讀書記》「朱子卷」有一條專引朱子稱述漢儒，尤其鄭玄之語，文中還不斷出現如「朱子深明漢儒之學」⁶¹、「朱子生平於此事最折服鄭君」⁶²、「其尊鄭也至矣」⁶³、「如此之類，皆於鄭注推服尊信甚至」⁶⁴等語，於是，朱子成為漢學的一分子，為鄭玄到清代漢學之間的銜接關鍵，陳澧立足漢學／鄭玄以窺朱子的情形，顯然可見。

朱次琦對朱子的歷史定位，則是立足於宋學，他說：

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⁶⁵

在朱次琦看來，朱子絕對是宋學者，而非漢學傳人。如果說朱子與漢學有關，那麼，便是參酌漢學以上求孔子之道，尤其此處指出朱子對後世的影響，乃人格典型之樹立，而非如陳澧所說，為對經說之傳述。著孔子之道，是歷代儒者的共同願望，但孔子遠矣，如何上求孔子之道？總得有所憑藉與據依，於是漢人注疏、宋人經說，便成為上求孔子的必要階梯，久之，便形成在孔子之下的另一個典範。所以雖以孔子為最終標的，但清代學者們，不自覺地選擇了漢或宋的階梯，這是為什麼朱次琦以朱子集宋學大成，又認為他使孔子之道大著的原因⁶⁶。〈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摺〉

⁶⁰ 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 69。

⁶¹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304。

⁶² 同前註。

⁶³ 同前註，頁 306。

⁶⁴ 同前註。

⁶⁵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 3。

⁶⁶ 按：方東樹有云：「程朱之道，與孔子無二，欲學孔子而舍程朱，是猶欲升堂而不履階由戶也。」《漢學商兌》（臺北：廣文書局，1977），卷上，頁 16a。這段話簡要地道出宋學者的根本理念，朱次琦的態度雖不若方東樹激烈，然其觀念是相同的。至於漢學，江藩有云：「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朝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霾，一朝復旦。」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 1，頁 34。其以漢學復興即是經術昌明，與宋學者是同樣的思考模式，只是一以漢學為階，一以宋學為準。

又云：

孔穎達，唐代通儒，其撰《正義》，自蕭望之、許慎、賀循而外，南北諸儒，若庾蔚、賀瑒、皇甫侃、熊安生諸人，莫不挾其疵謬，疏其結轡，而《禮記疏》中所根據於植者，凡二十九條，皆與康成顯然為異，而不敢少加評駁。至《詩疏》、《續漢書禮儀志》《注》、《通典》諸書，均多援引植注，而有宋朱子亦亟稱之，則植之於禮，純矣粹矣，焉得以學未顯著少之也。⁶⁷

此處以盧植異於鄭氏說，又為後人不斷援引的情形，作為肯定盧植《禮》學成就的證據，而朱子亦為極稱許盧植者之一，這可作為前引朱次琦所說「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的註腳，朱子之學，所取者廣矣，漢學為其一。朱子既著孔子之道，故為上探聖學的必要階梯，是以朱次琦立足宋學／朱子，以評騭歷代學術。

將時間點再往下移，來到清代這與陳、朱二人最貼近的時段，看二人對朱子與清代學術之關係的論述。

陳澧〈朱子語類日鈔自序〉云：

朱子之學，衰絕近百年矣……以語類繁博，擇其切要，標識卷端，冀可尋其門徑，亡兒宗誼鈔為一帙……嗚呼，兵燹流離之際，獨以舉世所不談之學，父子相講誦於空江寂寞之濱，其迂拙可笑矣……此編簡約，今以付刻，冀有因此而讀朱子之書，為朱子之學者，則吾將釋悲而為喜也。⁶⁸

陳澧以為朱子之學衰絕近百年，由陳澧往前推一百年，正是乾隆以來這段時間。事實上這段時間，因功名所繫，讀朱子書者仍大有人在，因此，陳澧所說衰絕，指近百年來之人皆未懂朱子學的真實內涵，相反的，他這部《朱子語類日鈔》，正欲表出朱子學之精華「切要」處。而陳澧對朱子的基本認識已如前述，這樣認識朱子的方法，的確與乾嘉諸學人迥異。《讀書記》朱子卷第一條引朱子教人讀注疏之語，並下結論云：

⁶⁷ 朱次琦，〈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摺〉，《朱九江先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下冊，頁3b-4a。

⁶⁸ 陳澧，〈朱子語類日鈔自序〉，見汪宗衍編，《陳東塾先生年譜》，「豐十一年辛酉五十二歲」條，頁87-88。

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如此。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⁶⁹

誠如此處所言，當時讀注疏者多訾朱子，因為在乾嘉漢學者眼中，朱子代表的是高言不實的宋學，陳澧以為此乃未知朱子之學，故欲鈔錄《朱子語錄》，欲於《學思錄》中發明朱子之學。但他所看到的朱子，卻是漢學傳人，為鄭玄到清代漢學之間的銜接關鍵，也就是清代漢學的前輩。其〈復劉叔俛書〉自述《讀書記》的內容云：

此書自經學外，及於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至宋以後，有宋、元、明學案之書，則皆略之，惟詳於朱子之學，大旨在不分漢、宋門戶。⁷⁰

其於《讀書記》中詳論朱子的原因，在於欲表現不分漢、宋門戶的胸懷。這正顯示當時學界，當然包括陳澧，常以漢、宋學的觀點看待中國學術⁷¹，而朱子則為共認的宋學典範，故舉朱子則可以概宋學矣。這注定了朱子與清代漢學間不可分割的關聯，著意打破漢、宋門戶者，尤其避不開朱子的問題，陳澧撰《鄭氏全書》，又編《朱子語類日鈔》；《讀書記》中專卷論鄭玄，亦專卷論朱子，正是最具體的例證。但就在他試圖塑造朱子的新形象，以打破漢、宋門戶的同時，卻反而突顯其偏漢學的傾向。朱次琦的情況亦然，他說：

朱子，百世之師也，事師無犯無隱焉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則攻朱子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考據為宗，則攻朱子為空疎。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乎？⁷²

他用王學之虛而攻訐朱子之格物，考據學講實而攻朱子之空虛，這兩種看來互相矛盾的情形，指出世人對朱子之誤解。放在朱次琦所處的清代來看，其指責漢學之非的意味更為深重。因為朱子並不空疎，就像朱次琦所強調的，朱子重格物，不如致良知之空疏；講究「讀書自克」，自克是建立在讀書的基礎之上，所以他向弟子所

⁶⁹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外一種）》，頁301。

⁷⁰ 陳澧，〈復劉叔俛書〉，《東塾集》，卷4，頁20a。

⁷¹ 按，《四庫全書》經部總敘之語，便是實例，其語云：「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學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頁53-54。

⁷²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3。

說「讀書之實五」，乃用「實」字形容其學，其中經學、史學、掌故之學，與漢學家所治者無異。朱次琦以此指出漢學家攻朱子為空疎之誤。只是，朱次琦所說的「實」的內涵與漢學家不盡相同。朱次琦有云：

魏晉以下，理道不明，恥尚失所，常有號稱名臣，智勇超出，而委贄累朝，覲顏陳力者，時論亦恬然不以為怪。顧亭林《日知錄》正始兩段，趙甌北《陔餘叢考》「六朝忠臣無殉節者」一段，言之最悉。嗚呼！此程朱講明性道之功，所以扶天綱，立人紀，追配孔孟而與天地無終極也，閤下以為然乎？⁷³

《日知錄》與《陔餘叢考》的內容，雖為筆記式的短篇，然無疑皆是考訂名作，《日知錄》尤為考據學家所稱述⁷⁴，但朱次琦稱述這兩本書，卻全然不由考據精博切入，而以其所考訂之史實，所表現的名節風尚、人品修為之角度立論，並話鋒一轉，而稱許程朱講明性道的扶天綱、立人紀之功，這與他「讀書自克」之思考是一貫的，而《日知錄》、《陔餘叢考》的考證成果之價值，在於證成這一人倫綱紀的道理，在於證明程朱講明性道之功，及其追配孔孟的成就，具「實用」之效⁷⁵，此即朱次琦所說的實學。相對的，陳澧對《日知錄》的稱述，則偏重其博洽的一面⁷⁶，重視廣博的文獻徵引及考證功力，為漢學家的「實」之定義⁷⁷，與朱次琦的實學並不相

⁷³ 朱次琦，〈答吳澄甫同年書〉，《朱九江先生集》，卷7，頁22a。

⁷⁴ 按：顧炎武的弟子潘耒（1646-1708）為《日知錄》作序云：「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考據之精，文辭之博辯，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日知錄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卷首，頁1-2。全祖望於〈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引王高士之言：「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1470。二者雖皆以負面的角度，嘆息顧炎武經世之志之不為人知，卻直接而正面地反應出清人對顧炎武的定位，在於考據之精博。

⁷⁵ 簡朝亮記述乃師常僞《大學衍義》、《資治通鑑》、《三通》、《日知錄》諸書，「為其多實用也」。《朱九江先生年譜》，頁41b。

⁷⁶ 按：陳澧之語曰：「鈔書之說有二：有鈔而讀之，有讀而鈔之。鈔而讀之者，〈鈔書自序〉之說是也。讀而鈔之者，《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皆其讀書時鈔錄群書而成一家之書，其學之博洽，乃或為古人之書所不及，此則鈔書、著書合而為一，蓋鈔書之極功矣。」〈顧亭林手鈔曲江集湛甘泉邱瓊山兩序跋〉，《東塾集》，卷4，頁4a。

⁷⁷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有云：「今所錄者，率以考據精核、論辯明確為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卷首，〈凡例〉，頁8。此論可為漢學家「實學」定義之代表，陳澧之觀點，正與之相一致。

同。因此，二人皆著眼於清代漢學與朱子的相同處，而指清人批評朱子之非，表面看來，二人對於清代漢學與朱子的關係之看法，極為相近，這也是二人皆被視為兼采漢、宋的原因之一，但這表面的同，深層裡蘊藏著根本的異。

總而言之，同一朱子也，而陳澧與朱次琦所見所論，竟如此的不同，正因為其偏漢或偏宋的立足點之故。所在的窗口不同，擷取的角度有異，望見的視野便各異。從大的角度來看，二人皆兼取考據、義理的方法，並肯定漢、宋學的成就，的確合於今人所述漢宋調和或漢宋兼采的特色，然就前所述，在或傾漢或傾宋的學術趨向，及相應的看待學術史的角度、評騭學術的標準等，二人實相異趨，錢穆所云：「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朱子。」⁷⁸可謂確論。

四、由陳、朱二人看漢、宋學問題

為數相當多的，論述晚清漢宋調和或漢宋兼采風氣者，其論據不外乎當時學人並重義理與考據，及同時肯定漢、宋儒的言論，但事實上，類似的言論，在學界認為漢、宋強烈對峙的乾嘉時期，亦非罕見，即被視為漢學大本營的《四庫全書》，其總纂官紀昀之漢學立場，及對宋學的強烈批判乃人所共知⁷⁹；《四庫全書》選書標準之偏向漢學，亦無可懷疑⁸⁰，然其經部總敘中亦有提倡漢、宋各取所長之語⁸¹。因此，由同時肯定漢、宋儒，及兼取考據、義理的方法，作為論述漢宋調和或漢宋兼采的論據，或許並不甚恰當，而漢、宋間的辯爭，在晚清是否已不存在，或是個

⁷⁸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640。

⁷⁹ 詳可參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漢學研究》20：1（2002），頁 253-274。

⁸⁰ 詳可參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香港：中華書局，1974）；趙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學術思想與方法論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R.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2（2005），頁 83-128。

⁸¹ 參註 71。

仍可再思考的問題。

由前述對陳澧與朱次琦的比較，可見二人所認定可藉以上求聖人之道的學術典型，分別為漢學、宋學，代表人物即鄭玄、朱子。因此，陳澧即使亦稱道朱子，但其所稱許的朱子，是以漢學／鄭玄為標準。章太炎批評陳澧云：

始句合漢、宋為諸《通義》及《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最多，放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翕盍，以為比類。⁸²

劉師培則云：

澧學鈎通漢、宋，以為漢儒不廢義理，宋儒兼精考證，惟掇引類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與摭拾之學相同，然抉擇至精，便于學童。⁸³

二人皆指出陳澧將鄭玄、朱熹／漢學、宋學加以類比的情形，但卻未道出陳澧如此類比的用意及原因。正因為陳澧已有預設的標準，用特殊的視野來看朱子，故其所見朱子，無不染上漢學／鄭玄的色彩。可見陳澧所持的學術標準，與乾嘉諸人無異，然處理二者之異的方式，則與乾嘉學人不同。張君勱以為江藩對於宋學，「其所以抑之者惟恐不力，其有可以表彰之者，則置不復道。」⁸⁴江藩被指為漢宋之爭中的漢學中堅分子，即此之故。與江藩相較，陳澧對宋學的表彰，可謂極矣，陳澧因此指被為漢宋調和的中堅分子。這樣的敘述，會使人誤以為陳澧與江藩立場相異，但事實上，陳澧的漢學立場就在對宋學的表彰中顯露無遺，然而，其面對異說的溫和態度與寬大胸懷，亦由此顯現。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朱次琦身上。朱氏重經史之學，乃人所共知，簡朝亮云：

先生曰：經誼所以治事也，分齋者歧矣。（邱文莊《大學衍義補》嘗辨分齋之非）經學，所以名儒也，分門者窒矣。（近人著書有以經學名儒分門者）

⁸⁵

可見朱次琦雖宗宋學，但並不如清代漢學家所說的宋學者，空疏而不實，經史之學

⁸² 章太炎，〈清儒〉，《噓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62。

⁸³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劉申叔先生遺書》，頁669。

⁸⁴ 張君勱，〈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頁14。類似張氏之論極多，茲不具引。

⁸⁵ 簡朝亮，〈朱九江先生講學記〉，頁5。

反而是他教學的重要部分，他讚許漢學／鄭玄的成就，肯定清代考據諸作的貢獻，即此之故。朱氏高足簡朝亮撰有《尚集注述疏》、《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孝經集注述疏》、《讀書堂答問》等與清代漢學家類似的著作；簡氏弟子黃節、鄭實等，後來為國粹學派的重要人物，皆非無由；而朱氏之被指為調和漢宋者，亦非無故。然而，與漢學家不同的是，朱次琦不以為經學是可以獨立的學問，錢穆述朱次琦之著作，而曰：

即觀其書目，其學蓋本性理以通之史，而尤要在人物，即其所標修身讀書之實也。⁸⁶

由於朱氏著作除性理之學外，以史學方面最多⁸⁷，故錢穆僅言及史學，事實上在朱氏教學中，經學的分量，恐超乎史學之上，觀簡朝亮之著作可以想見矣。誠如錢穆所言，朱次琦之學，實以性理為本，因此，雖亦肯定漢學／鄭玄的成就，但他是以宋學／朱子為標準，由宋學的視野望出，漢學的成就，自與陳澧所重視的淵博學識，與必求確解的求知態度相異。在朱次琦看來，漢學之意義，在於讀書過程中培養出的人格氣度；精細的考證成果之價值，在於證成人倫綱紀及講明性道之功。因此，朱次琦雖對漢學持相當友善的態度，但他的宋學立場，就在對漢學的稱許中表露無遺。

賀嶽僧以為清代程朱學派在與漢學的爭辯中，逐漸讓步，「最後已讓步到漢宋兼採的折衷態度為止。」⁸⁸以朱次琦衡之，賀氏之說誠有待商榷。因為雖具漢宋兼採的態度，但朱次琦的宋學立場並未讓步，反而在對漢學的稱說中，充分顯現。不同的是，具門戶之見者如方東樹，對漢學的肯定，僅止於「天文、曆算、輿地、小學」⁸⁹，並以為其考證成果「無關宏旨」，「無關於身心性命、國計民生」⁹⁰；朱次琦則指出考證成果有能與程朱義理相映證者；經學、史學、掌故之學等，皆能與性

⁸⁶ 錢穆，〈朱九江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頁327。

⁸⁷ 按：今所知朱氏史學方面著作有，《國朝名臣言行錄》、《國朝逸民傳》、《五史實徵錄》、《晉乘》，及倣《明儒學案》論國朝儒宗而未有書名者。

⁸⁸ 賀嶽僧，〈清代漢宋之爭〉，《時代精神》8：3（1943），頁31。

⁸⁹ 方東樹，〈上阮芸台宮保書〉，《儀衛軒文集》（清同治間刊本），卷7，頁1b。

⁹⁰ 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下，頁14a。

理之學相輔相成；漢儒之人格亦有堪與宋儒媲美者。反過來看漢學的部分，乾嘉學人對宋學的肯定，幾皆集中在宋人的節行方面，惠士奇所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便是最具代性的例子，阮元於〈擬國史儒林傳序〉中所強調漢學家是經儒，宋學家是師儒⁹¹，更將乾、嘉以來，漢學家心目中的漢、宋之別，作了簡要而中肯的總結。雖然阮元此說，被視為具兼采漢、宋的傾向，但我們不能忽略，他這樣的敘述，實乃對宋儒的經典解釋之否定，此與江藩標舉「治經宗漢儒，立身宗宋儒」⁹²，看似兼取漢宋之長，實則提倡解經不取宋儒的作法⁹³，並無大異。陳澧對朱子的論述，雖是以漢學／鄭玄為標準，但他卻突破乾嘉學人，而將宋學／朱子，納入經典解釋的系統中，其異於具門戶立場的漢學家，由此可見。

可見漢、宋之爭得以降溫，漢、宋學雙方都有一定程度的調整與堅持，堅持者，即其或漢或宋的學術趨向，以鄭玄或朱子為典型的學術標準；調整者，即在某種程度上把對方「收編」，既將對方收編了，彼此便不是相異的陣營，其爭可息矣，但其主觀立場與堅持，反而在此調整的過程中益形顯現。然其有立場而無偏見，具主觀意見而無意氣之爭的寬大胸懷與包容態度，不能不說是漢、宋學在晚清的新面貌。以此胸懷為前提，方能取他山之石以為攻錯，故陳澧雖以漢學為主，亦知「義理愈紬繹愈深，真無窮矣！」⁹⁴並且不至有「使有宋不得為代，程朱不得為人」⁹⁵的偏激態度；朱次琦雖主宋學，亦不至如方東樹之「肆口無忌」⁹⁶。誠如紀昀所云：「儒者之患莫大於門戶」⁹⁷，清初以來，學人們即以門戶之爭為戒⁹⁸，乾嘉學術之興，原

⁹¹ 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擘經室集·擘經室一集》，卷2，頁37。

⁹² 江藩，〈漢宋門戶異同第十五〉，《經解入門》，卷3，頁5a。

⁹³ 按：江藩於〈漢宋門戶異同〉一文中，明指漢儒之解經信而有徵，宋儒解經則多「臆造」，並下結論云：「此漢、宋二家之所以異，而經家之所以不取宋儒也。」（同前註）其排拒宋儒經解之意，極為顯著。

⁹⁴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頁185。

⁹⁵ 方東樹，〈漢學齋兌〉，卷下，頁11b。

⁹⁶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576。

⁹⁷ 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四·儒家類四」提要後之案語，《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1冊，頁1237。

⁹⁸ 可參拙著，《回歸孔孟——明末清初儒學風氣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第三章第三節，「杜絕門戶之爭」。

亦為解決經典解釋的爭執，晚清如陳澧與朱次琦等具漢、宋立場，而無漢、宋門戶的學者，即承此前人之志，而更進一步深化與實踐。

五、結論

由於漢、宋學問題牽涉極廣，內容紛繁，為免治絲益棼，本文僅從其中一個面向切入，從學術歸趨的角度，比較陳澧與朱次琦對朱子的論述，以釐清二人的學術特質，檢視關於漢宋調和的論述。

筆者先釐清陳澧與朱次琦的漢、宋學趨向，及其無門戶的態度，再以此為基礎，比較二人對朱子的論述。陳澧與朱次琦所論述的朱子，從表層來看，的確有不少相似之處，如同樣強調朱子重視「讀書」，及其踏實的學風，並因此論朱子與漢學的關係、朱子與鄭玄的關聯，及清代漢學與朱子之間的關聯，同時指出漢學家批評朱子之不當，以消除漢、宋學間的門戶之見，二人皆被視為具漢宋兼采特質者，以此之故。然而深入裡層，便可發現二人本質上的差異，如在讀書的內容上，朱次琦對性理之學的重視，分量遠超乎陳澧。強調讀書實學的因素，陳澧著眼於漢學的弊病，朱次琦著眼於心學的空虛。對於朱子本人的成就，陳澧偏重專門的學術成果，強調朱子的博學，特意提出朱子對訓詁、音韻、禮學等方面的重視；朱次琦則強調性理之學的全整之人格修養，重視朱子釋經的態度，拈出朱子於經解中所表現的人格氣度，而非學術問題的是非判斷。對於朱子在學術史上的定位，陳澧立足於漢學，以朱子為經學家，為孔、賈義疏頒行後，維持鄭學不墜的一絲命脈，為鄭玄與清代漢學之間的銜接關鍵；朱次琦則立足於宋學，以朱子為集宋學大成者，同時強調朱子即漢學而稽之，以會同《六經》，權衡《四書》，因此以朱子為上求孔子之道的必要階梯。就清代學術與朱子的關係，二人皆反對清代漢學家對朱子的批評，以為時人未得朱子之真，關鍵皆在朱子與漢學家一樣講究實學，但陳澧所見的朱子實學，為與漢學家相同，重訓詁考據的治學方法；朱次琦所見朱子實學，為由讀書自克的

實用之學，清人推許的考據著作之功，在於證成朱子扶天綱、立人紀的價值。可見漢、宋之歸趨，決定了學術判斷的立場、標準，及打破漢宋門戶的方法之異。由此角度來看，將陳、朱二人，籠統地歸入漢、宋兼采或調和的大框架中，是有待商榷的，而今日相當普遍的，對晚清漢宋調和風氣之論述，亦有再深入分梳的必要。

經由對陳、朱二人的分析，可見漢、宋不再強烈對峙，並非因為立場的讓步或標準的轉換，而在於調整態度，並將對方收編於自己的系統之內，但其立場與堅持，就在此調整的過程中益形顯現，這是僅由稱述考據、義理或鄭玄、朱子的表面文字，所無法見出的。然而，立場與主觀意識，不必然等同偏見與意氣之爭，陳澧與朱次琦對異說的寬大胸懷與包容態度，乃承清初以來，以門戶之爭為患的訓誡，在乾嘉學術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與實踐的結果，為漢、宋學在晚清的新面貌。

引用書目（按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一）古籍

方東樹，《漢學商兌》，臺北：廣文書局，1977。

方東樹，《儀衛軒文集》，清同治間刊本。

江藩，《宋學淵源記》，臺北：廣文書局，1977。

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江藩，《經解入門》，臺北：廣文書局，1977。

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朱昫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

朱熹，《朱子語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全祖望，《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阮元，《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林伯桐撰、陳澧補編，《學海堂志》，臺北：廣文書局，1971。

-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 章太炎，《尙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陳澧撰、楊志剛編校，《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
- 陳澧，《漢儒通義》，臺北：華文書局，出版年不詳，影印《東塾叢書》本。
- 陳澧，《東塾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影印富文齋刊本。
- 陳澧，《東塾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2：3（1931），頁177-196。
-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
- 戴震，《戴東原先生全集》，臺北：大化書局，1987。
- 簡朝亮記，《朱九江先生講學記》，收錄於《朱九江先生行誼輯述》，香港：旅港南海九江商會，1976。
- 簡朝亮編，《朱九江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晚清名儒年譜》，影印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

（二）今人論著

1、專書

- 朱稚華，《陳蘭甫與朱鼎甫漢宋調和之比較》，臺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4。
- 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香港：中華書局，1974。
-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事業公司，1978。
- 李時權主編，《嶺南文化》，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 林慶彰等主編，《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 林慶彰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 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3，2版。
- 梁啓超，《儒家哲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6。
-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 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
- 曹美秀，《回歸孔孟——明末清初儒學風氣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 曹美秀，《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
- 葛榮晉，《中國實學思想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 趙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學術思想與方法論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臺2版。
- R. Kent Guy, *The Emperoe's Four Treasur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期刊或專書論文

- 丁寶蘭，〈簡論朱次琦〉，《中山大學學報》4（1983），頁77-83。
- 何佑森，〈阮元的經學及其治學方法〉，《故宮文獻》2：1（1970），頁19-34。
- 李緒柏，〈陳澧與漢宋調和〉，《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2005），頁80-85。
- 徐復觀，〈兩篇難懂的文章〉，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學生書局，1985，

頁 469-490。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2（2005），頁 83-128。

張君勱，〈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再生》台 4：3（1974），頁 1-24。

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漢學研究》20：1（2002），頁 253-274。

張麗珠，〈從「漢宋之爭」看清代的義理學轉型〉，收入《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理論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頁 161-214。

曹美秀，〈陳澧《漢儒通義》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0（2007），頁 267-306。

賀嶽僧，〈清代漢宋之爭〉，《時代精神》8：3（1943），頁 21-31。

楚 金，〈道光學術〉，收入沈雲龍，《中和月刊史料選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61 輯。

劉德美，〈阮元的考據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4（1986），頁 109-139。

錢 穆，〈朱九江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頁 319-328。

謝寒楓，〈論陳澧經學觀的形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2（2008），頁 28-33。